

绥靖战略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绥靖战略

(上册)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绥靖战略

(下 册)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Keith Middlemas

THE STRATEGY OF APPEASEMENT

Quadrangle Books, Inc., Chicago, 1972

根据芝加哥夸德伦格尔图书公司 1972 年版译出

绥 靖 战 略

〔英〕基思·米德尔马斯著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 字数 400,000

1978 年 10 月第 1 版 197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3188·5 定价：2.05 元

内 部 发 行

译 者 的 话

本书对 1937 年至 1939 年间英国张伯伦政府对德国推行的“绥靖政策”以及在慕尼黑会议前后的外交活动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书中有英国政府新公布的 1939 年的档案及一些原始材料，这对我们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历史，剖析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反动实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我们把它翻译出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慕尼黑协定刚刚签订之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关于国际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个英明的论断。张伯伦作为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维护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在希特勒的法西斯侵略战争日益逼近的时刻，仍顽固地拒不接受斯大林提出的结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一心要把祸水东引，引向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并在换得“一代人的和平”的幌子下，公然出

1937 6.3.28

1

卖和牺牲小国利益。张伯伦从希特勒那里拿到了所谓“英德宣言”以后，洋洋得意，大吹大擂，把这一纸空文称为“我们时代和平的标本”。和平，决不是从侵略者那里所能乞求到的东西，因此，张伯伦之流推行的“绥靖政策”，当然达不到他们原来想把祸水东引的企图，到头来，祸水冲到了自己的身上。正如毛主席英明地指出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绥靖政策”使欧洲各国人民吃了大亏。这个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本书作者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显然没有也不可能从英国在1937年至1939年间的对德政策，特别是从慕尼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和教训；也不可能对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作出正确的评论，在某些方面，甚至为张伯伦的投降主义辩解，如认为“张伯伦的对外政策，在狭义上是讲现实的，是适应英国当时实力不足的情况的”。这是十分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又如作者还认为张伯伦的错误只是在于忽视“重整军备”和“舆论教育”，以及在“情报工作”方面的疏忽，这就掩盖了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反动实质。希望读者注意批判。

本书根据美国芝加哥夸德伦格尔图书公司1972年版本译出。作者基思·米德尔马斯是英国苏塞克斯

大学历史学讲师，在英国下院当过八年职员，曾写过一部斯坦利·鲍尔温的传记和其他一些著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又较仓促，译文难免有错误和欠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1976年2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 一 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国与德国	15
第 二 章 张伯伦的道路	74
第 三 章 权力和影响	101
第 四 章 积极考虑	187
第 五 章 德国的消极态度	268
第 六 章 1938 年 3 月	309
第 七 章 表面文章	335
第 八 章 法国的转变	356
第 九 章 伏魔幻梦	411
第 十 章 重新估价	477
第十一章 勉作抉择	525
第十二章 龙虾与捕虾篓	580
第十三章 和平的代价	636
第十四章 清算	706

引 言

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力量均势，1937—1939年的英国外交政策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1938年张伯伦政府所规定的绥靖政策，通常被视作英国虚弱之极的标志，但也被认为是在欧洲牵制独裁者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企图，是英国困难处境的一种必然结果。自1938年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著真是卷帙浩繁，已经到了可以就此编纂一部专史的程度了。对于研究国际事务的历史学家来说，掌握捷克、波兰、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资料已成了为人熟知的英国、德国和美国文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因此，应该为这本不象样的书作一点辩解，它不仅仅是为了充数，而是为了几乎全部集中论述这一问题的一個侧面。

本书论及的那些问题，始于对1933—1936年间英国政策的早期研究。^①1934年国联裁军会议失败至1936年底，这一期间的前后一贯的对德政策已经出现。此项政策可以最恰当地描述为：运用卓有成效的轰

炸机空中力量这一现代概念中的威慑手段为后盾，以谋求英德缓和。1935年拉姆齐·麦克唐纳辞职和斯坦利·鲍尔温继任首相之后，此项政策通过政府的决策机构(内阁、外交部、军事顾问和民政部门)得到了广泛发展，也完全符合1925年洛迦诺公约所规定的对法国和比利时承担的战略和外交义务。同时，这项政策还表明要在英联邦各自治领所能接受的范围内直接卷入欧洲安全问题。

1934年国防需要委员会的那份极其重要的报告曾明确指出，德国是英国安全的最大威胁。自那以后，对世界其他紧张地区的外交政策都以这种缓和为首要目标而加以调整。这样，就出现了在远东与日本妥协或与美国一起拟定一项遏制政策的尝试；中东的某些对全局至关重要的问题，尤其是苏伊士运河问题，已由1936年的对埃条约解决了；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看来已经保障了印度作为第一个非白人自治领的前途。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鲍尔温政府通过在欧洲内部寻求盟国(通过1935年4月建立斯特雷扎阵线和同年向俄国提出的建议)来支撑这项对德政策。

1937年内维尔·张伯伦担任首相之后，从研究内阁的档案来看，他的外交政策已经远比通常所说的那样更加从根本上背离了早期的这种传统。首先，虽然他

在这以前担任过五年财政大臣，但他强制推行了一项预先制定的包罗万象的政策，自从他 1934 年首次攻击鲍尔温路线以来，这项政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他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现代英国政府中造成一种几乎是独特的局面，以便他独断专行地管理着一个基本上唯命是听的内阁。在这种局面下，外交部和军事顾问们都服从于由一个人数很少的核心集团决策的过程。同时，财政部的那套标准和一种定量配给制度也被塞进重整军备计划中去了。威慑手段放弃了，而赞成一种仅仅为了击退德国对英国的直接进攻而采取的防御战略。为了对付那使人忧心忡忡的“毁灭性打击”，空军战斗机的实力加强了，轰炸机的攻击力量却被牺牲了；曾经承诺保卫法国东北部和比利时的陆军野战部队，也被缩减到无足轻重的地位。

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一面从欧洲撤退，一面又对欧战的潜在根源更加敏感这两者的奇妙的混合。外交部负起了与世界上不太咄咄逼人的威胁者——意大利和日本——进行妥协的责任。1938 年 2 月以后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说过：“外交必须负起责任以减少英国的敌人。”^②此后，政府就希望可以不受约束地向德国作出更为明确的表示，以平息其不满；并且在不是出于对威慑的畏惧，而是出于共同利益以及在各自势力

范围的基础上达成一项解决办法。英国担保自己对中欧的一些多事的地区（按照德国的提法，是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作单方面的解决。作为一种副产品，与法国的协约可以搁置起来。

为了理解在张伯伦担任首相仅仅十四个月之后，英国人怎么会有代表出席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有必要对这种变化作出更为充分的说明。同样，英国始则企图损害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继而又企图支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波兰领土的安全，要说明这种古怪的情况，也需要评价一下英国政策中的潜在的连续性。

关于英国的动机问题，以前进行过多次详尽的讨论，在英国就有两个不同的历史学派作过讨论，一派侧重于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长远计划，另一派则着眼于德国政策的实用主义性质、希特勒力量的限度和西方外交的愚蠢。^③ 争论的焦点是对希特勒意图的评价——他是否把决定战争当作一种政策手段，或者他是否利用西方领导人所提供的机会而莽撞地投入1939年的冲突——和英法政策所以形成的背后意向。论战性的作品成篇累牍地出版，以致“绥靖”一词在公众的心目中，成了无力废除实力的象征，而深深扎根在流行的神话中了。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人们对于英国实力的限度，军事上软弱而造成的收缩，在海外所承担的义

务,对自治领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孤立主义等等,都没有充分加以考虑。根据三十年即可解密的规定,1939年以前的英国档案现在公开了,因此我们有可能较为充分地分析张伯伦政府是如何理解国际形势的,以及他们试图干些什么。鉴于近年来有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详尽研究的著述可供参考,我们就能将这两个学派加以比较,从而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到底是内阁政策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假定说,那些遭到拒绝的其他替代办法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接下来打算根据新近得到的关于政策形成过程本身的文件,来谈一谈对英国政策的初步看法。已出版的《英国外交政策文件汇编》(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使我们看到了外交机构是怎样工作的,情报是怎样得到的,以及政府的决定是怎样传递的。但是这些文件通常都没有提供那种表明政策在外交部是如何制定的备忘录;而且更重要的是,此类文件的价值都没有经过鉴定。在整个政府机构内,外交部只是一个组成部分。虽则外交大臣始终握有实权,但他并非外交事务上的唯一决断者。他和首相及内阁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两次大战的间隔年代中曾经多次变动。要判断那些发自某大使馆或外交使团的电报的重要性,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电报是原封不动地送往内阁,还是由外交大臣

作为综合述评的一部分而递交的。举一个具体例子：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发回的关于希特勒在1938年9月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战争的电报，与陆军武官梅森·麦克法兰上校的电报相矛盾，在这里，究竟谁的电报最直接地呈交内阁呢？至于那些发出去的指示采取行动的电报，是内阁核心集团在同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进行商讨之后产生的呢，还是由外交部本身首先提出来的呢？在阅读所有这些外交材料时，必须在思想上对政府的作风以及重大决定如何作出的细节问题有所了解。

已公布的材料的第二个缺点是，它们大多数是外交方面的。关于制订战略计划方面的历史记载已经分散了——这样做的效果是不好的，因为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1937年春季，张伯伦接替鲍尔温担任首相时便开始了的对防御政策及其准备工作的大检查，对英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行动自由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一直继续到1939年3月再度检查防御工作时为止。防御经费的规模以及三军之间的平衡，不仅影响着被视为可能的外交政策的类型，而且还提出了甚至是决定了什么是可取的。

内阁会议记录的公开，以及有时象外交政策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委员会和帝国国防委员会这些

内阁委员会的更重要记录的公开，尽管没有透露什么明显内容，却能使历史学家看到英国政策的全部性质，并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对这种政策加以判断。如1937年末向墨索里尼提出的倡议，就是在不仅考虑到地中海的防御形势，而且也考虑到远东地区防御形势的情况下制订出来的；这项倡议还考虑到军方武断的估计，预算平衡政策的维持，以及工会对调动熟练劳动力的要求可能作出的反应。在把某项政策与另一项政策相比较而加以鉴别时，历史学家必须了解，那些做法之所以根本行不通，是由于经济上的代价，还是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

政策只能建立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届内阁，对有关德国的政治状况都缺乏了解。内阁的一些文件表明，政府是如何部分地依靠经验，部分地依靠直觉（只能这样称），在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决定的。这些问题包括诸如德国领导人中间温和派和极端派力量的对比问题，德国人对答应给他们殖民地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日耳曼人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可能作出什么反应等。这些文件还显示出当时对情况是如何估计的，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提出来才最有可能打动各个大臣。

此外，内阁文件还着重指出了一些模糊但是重要

的因素。在1937年的英帝国会议上,各自治领对英国在欧洲承担新义务的态度,大致清楚地表达出来了。其后,对于英国任何过分卷入欧洲的行动,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都表示反对(只是澳大利亚在程度上不如前者强烈),以免削弱这个母国保卫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能力。直到1939年9月底为止,对帝国可能瓦解的担忧,成了限制政府行动自由的非同小可的压力了。

由于缺乏法国的外交文件,要估计在慕尼黑和解中,英国与这个第二号伙伴的关系,始终是有困难的。内阁文件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英国的态度,尽管这些文件是单方面的,但也说明了许多在当时和后来的英国观察家看来,法国政治领导人方面一味动摇的情况。

但是,政府档案的最大价值是,揭示了鲍尔温政府以及后来的张伯伦政府制定政策的自然过程。当我们能对政府内部许多方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提供的不同意见加以估价,并且能够对各种人物的风格、大臣们组成的那个统治集团和内阁中反对派的存在情况都加以描述的时候,理解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就比较容易了。尤其是,艾登和哈利法克斯这两位外交大臣所采取的奇怪立场现在变得更加清楚了,而对那些在白厅庭园外边的压力集团的影响(如果存在这种影响的话)也能加以估计了。再加上目前能够获得的许多私人收藏的

文件，就可以对当时政策如何制定的情况作一个相当连贯的叙述——一个大致符合那一时期的工作方式的叙述，而且可以根据实际经验用慕尼黑会议后六个月中政府的行为来检验。

本书使用的私人收藏的文件，以张伯伦的日记手稿和他在从政生活中几乎每周都要写给他的两个妹妹艾达和希尔达的信件最为重要。这些文件只被他的两个传记作者基思·法伊林爵士和伊恩·麦克劳德极其审慎地利用过。塞缪尔·霍尔爵士和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的文件集，还有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的日记手稿，虽则不象官方文件那样有权威性，但较少拘束，并且把个性的影响和不同人物个性的相互作用讲明白了——说明1937年间张伯伦政府在打破英国政策的既有传统方面走得多远，而且尽管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外，这种情况又是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建立在内阁一致的基础上的。

此项研究是从内阁的观点出发的，因此在查阅外交部的大量档案时，是进行了审慎的挑选的。只用了有限的事例来说明官员中的分歧和这种分歧在外交部内在对德政策的总发展上所产生的作用，以及说明根据同一情报而得出的多种结论对历届外交大臣有何影响。至于对外交部在张伯伦体制的后期保留何种总的